
语言规划理论的新发展

——语言管理理论述略

山东财经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王英杰*

[提 要] 语言管理理论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是由 Jernudd、Neustupný、Nekvapil 等学者提出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型语言规划理论,旨在分析语言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语言管理理论将语言管理分为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这两种管理出现在不同的层面。简单管理仅对个人交际行为中出现的进行管理,组织性管理则是基于个人交际之上,涉及多个交际情境,往往由相关机构参与的语言管理。语言管理理论认为语言管理是一个过程,包括偏离规范、注意、评价、选择调整方案和实施调整方案等不同阶段。语言管理理论不仅进行语言管理,而且涉及与语言相关的交际管理和社会经济管理。此外,语言管理理论具有理论整合潜能,可以与许多语言理论进行对话和整合。

[关键词] 语言规划; 语言管理; 语言管理理论; 简单管理; 组织性管理

1 引言

在国内,语言管理通常指语言资源的规划管理(陈章太,2009)和语言生活的管理(李宇明,2011)。

1986年,加拿大魁北克的语言规划国际研讨会上,Jernudd & Neustupný(1986)首次将“语言管理”^①作为理论引入社会语言学与语言规划领域,认为语言管理的关键是确定语言问题和解决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包括从语音层次到社会的各个层次,

* 作者简介:王英杰,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在读。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Email: melonboy2008@163.com; 通信地址:250014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信箱。

① 本文将 Language management 和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翻译为“语言管理”和“语言管理理论”。台湾学者林蒔慧(2005)将其翻译为“语言处理”和“语言处理理论”;周庆生(2005)的译文是“语言治理”和“语言治理理论”。

语言问题的解决需要将语言问题置于话语 (discourse) 中, 需要整合微观和宏观语言学的方法。

随后, 在语言规划研究领域, 许多学者或多或少地提及语言管理。Cooper (1989: 40) 提出了包括语言管理在内的多个语言规划术语, 并探讨了 Neustupný 早期提出的语言修正 (language correction) 和语言处理 (language treatment) 概念。Kaplan & Baldauf (1997: 27) 将语言管理这一术语等同于法语 *aménagement linguistique*。Spolsky (2004, 2009) 将语言政策分为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三部分: 语言实践、语言态度 (beliefs or ideology) 和语言管理。Spolsky (2004) 起初把直接干预语言的行为称作语言管理; 与语言规划、语言工程 (engineering)、语言处理 (treatment) 相比, 他更偏好使用语言管理这个术语, 但没有明确地给出偏好的原因, 也没有区分这几个术语。后来, Spolsky (2009: 4) 将语言管理定义为某领域具有或声称具有权威的个人或团体, 针对该领域的参与者, 采取的修正语言行为或语言态度的行动, 这种行动是显性的、可观察的。

以 Jernudd 和 Neustupný 为代表的语言规划学者不满足于仅仅界定语言术语, 也不像 Spolsky (2004, 2009) 仅将语言管理视作语言政策的一个具体操作层面, 而是将语言管理发展为一套完整的语言规划理论。

进入 21 世纪, 语言管理理论研究日益活跃起来, 研究者在澳大利亚、日本和捷克先后召开了三届国际研讨会, 出版了论文专辑《接触情境中的语言管理——欧洲、亚洲、大洋洲视角》(*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 (Nekvapil & Sherman, 2009a), 在查尔斯大学文学院创建了网站 (<http://languagemanagement.ff.cuni.cz>),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语言管理理论, 并以此为理论框架进行研究。

2008 年 8 月, 语言管理理论研究者们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召开了首届语言管理理论国际研讨会, 重点探讨语言管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注意” (noting)。2012 年学术期刊《亚太交际学报》(*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第 22 卷第 2 期以“注意”为主题, 刊发了此次国际研讨会论文, 这些论文既探究“注意”这一概念的理论阐释, 又关注实际语言接触中的“注意”现象。

2011 年 10 月, 日本早稻田大学召开了以“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规范多样化与语言管理理论”为主题的第二届语言管理理论国际研讨会。会议分为 5 个研讨组——语言规范与交际、语言规范与标准、语言规范的维度、语言规范与社会、语言规范与教育。除了语言规范外, 此次研讨会还关注语言管理、交际管理、社会经济管理三个管理层次的关联。

2013 年 9 月, 捷克查尔斯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国际研讨会, 此次会议主题是语言管理理论的方法论。以往两届研讨会, 仅捷克、日本、澳大利亚三个语言管理理论发展与应用最为活跃的国家有学者参与, 而此次研讨会, 除了以上三国, 还有美国、奥地利、肯尼亚、台湾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了研讨。我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苏金智教授以“语言管理的层级” (*The Hierarchy of Language Management*)

为题参与研讨,建议语言管理理论应使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书面语和口语管理,应重点关注组织性管理和语言标准化(苏金智,2013)。

② 语言管理理论产生的背景

语言管理理论的提出既反映了时代变迁对于语言规划的新诉求,又是语言规划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2.1 语言管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冷战结束后,民族自觉、民族区域自治或独立成为后冷战时代的特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尊重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成为各国的共识。各民族语言接触增多,如何进行有效的语言规划、进而解决日益增多的双语/多语社区的语言问题上议事日程。如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之后,捷克境内存在四大语言社区: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和德语社区,如何科学管理多民族语言,有效促进语言交际,为捷克的语言学家特别是布拉格学派提供了研究课题。此外,全球化加剧和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自觉、欧洲移民潮的出现、欧盟通用语言(language-in-common)政策的实施、海外留学与国际交流的增多、语言的接触和文化的碰撞,都为语言管理理论提供了研究土壤。

2.2 语言规划理论的新发展

二战之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国家建立,语言规划迅速发展起来。在那个时期,研究者普遍乐观地认为政府能够如同规划经济般来规划语言,解决语言问题;当时,语言规划的显著特征是国家层面上由政府或权威机构主导制定和执行语言政策。Jernudd & Neustupný(1986)、Nekvapil(2006)认为“语言规划”一词应该专属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理论和实践,他们引入“语言管理”这个新术语,专指语言规划发展的新阶段。语言管理强调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于个人和社区交际的语言管理方法,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规划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语言管理方法,由政府或权威机构实施,这种语言规划实践同样反映在语言规划理论模型上,如Haugen(1983)提出的语言规划模型将语言规划分为社会(即地位规划)和语言(即本体规划)两个维度,就是在国家层面由政府或权威机构主导制定和执行语言政策,并不关注个体或社区层面;再如Cooper(1989)提出从八个方面分析语言规划,即:什么样的规划者、试图影响什么样的行为、针对什么人、为什么目的、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采取什么决策过程、达到什么效果,也是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理论模型。

语言管理理论是语言规划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随着语言规划研究的发展,为了弥补“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的不足,语言规划研究领域逐渐从“规划型”转变为“管理型”,研究重点从“自上而下”转移为“自下而上”的语言管理。Mühlhäusler(1996:311-312)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语言规划的前提还是将语言多样性视为问题,解决此问题只能通过精简和中央计划。Jernudd(2009:251)认

为现代国家语言规划、标准化，排斥变异，而后现代国家则认可变异。语言管理学派是“从学术上对人民权利做出的一种反应”，它反对“规划”派的强制性举措，反对语言上的净化主义（purist ideology），“认可多元的利益诉求”（Jernudd, 1993 : 134）。

2.3 语言规划的研究趋势

从研究趋势上看，语言规划正从宏观走向微观。Tollefson（2002 : 425）曾预测未来语言规划从宏观向微观问题转向，可与交际民族志、微观社会语言学等理论联系起来。语言管理理论正是将研究关注的焦点放在微观层次民众的交际问题，强调宏观层次的语言规划研究必须基于微观层次——民众语言交际问题的解决，其研究方法也是整合会话分析理论、交际民族志等理论。Jernudd（2009 : 246）强调交际是人的话语过程，语言管理理论以此为前提，应重视话语和参与话语中的人；语言管理理论的研究重心不应局限在宏观层次的地位规划，而是应该放在现实话语中的语言问题上（Jernudd, 2003）。

2.4 语言规划理论与布拉格学派

语言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得益于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与社会语言学、语言规范研究传统。

布拉格学派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侧重于从功能入手研究语言形式，常被称作是功能主义者或功能语法学派。语言管理理论继承了布拉格学派功能主义传统，强调研究真实语境下的交际话语，从语言交际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结构语言学对于标准语言的规范并不感兴趣，但布拉格学派却与之不同，提出标准语言（standard language）的语体划分原则（刘润清，2002 : 92）。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就积极参与了捷克标准语的规范化工作和语言规划研究工作。布拉格学派的理论被认为仍具有现实意义（Garvin, 1973），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提出了“培养”（Cultivation）的概念，强调把语言规划作为一个长期深入的过程看待，而这是当代语言规划者所大力提倡的。同时，布拉格学派不仅重视相当于本体规划的语言培养，而且重视交际过程培养，即语言使用的培养（Nekvapil, 2010）。

布拉格学派的语言规范理论对语言管理理论创立者之一、当代布拉格学派代表学者Neustupný影响很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Neustupný即开始语言规划的研究。随后，很多学者与Neustupný一起将布拉格学派提出的语言规范理论及相关观点引入到语言管理的研究中（Nekvapil & Sherman, 2009b）。

③ 语言管理理论

语言管理理论主要指由Jernudd与Neustupný（1986）、Jernudd（1991）、Neustupný（2002）、Nekvapil（2006）等逐渐发展而成的语言规划理论。语言管理理论将宏观的语言规划基于语言问题之上，具体的语言交际被视作语言问题的主要来

源,将语言规划的理论重心从宏观维度转移到了微观维度,即从国家、组织层面转到个人语言交际的维度。语言管理过程的理想模式是:识别、确定个人会话交际中的问题→具体的语言规划机构采取具体的语言措施→在个人会话交际中执行这些措施。

Neustupný(1994:50)明确指出语言规划应该考虑出现在会话中的语言问题,只有解决会话中的这些问题,语言规划的过程才是完整的。

语言管理理论是基于语言使用的两个过程:①话语的产生和接受,②针对话语产生和接受的语言活动[与Fishman(1972)提出的“针对语言的行为(behavior-to-language)”一致],后者被称作语言管理。如在会话过程中针对某个很难辨别的单词发音(过程①),微观层次上,说话者对话时会小心翼翼地重复,免得听话者听不懂;而在宏观层次上,学术机构会将该音标准化并由政府部门批准(过程②)。Jernudd(2009:245)认为语言管理理论就是系统、明确地研究交际过程中个人的表达(话语的产生与接受)与对表达的注意(noticing)和评价(evaluation)结果(元语言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些元语言活动可能在交际过程中即时发生,也可能稍后发生。

3.1 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

语言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区分简单管理(simple management)和组织性管理(organized management)。简单管理是管理出现在个人交际活动中的问题(Neustupný & Nekvapil, 2003)。如电视采访中的主持人使用了某个口语表达之后,马上说出相对应的标准表达[会话分析理论称之为自我修复(self-repair)]。

除了简单管理之外,语言管理理论包括更复杂的管理过程,即涉及多情境的、有时带有某种或强或弱的机构性特征,语言管理理论将其称作“组织性管理”(Nekvapil, 2009)。

简单管理逐步过渡到组织性管理。如在家庭中,语言管理通常是简单的个人话语修复,但在多语或双语社区的家庭中,当父母讨论决定是否用某种表达或语言变体时,往往与意识形态有关,这就属于组织性管理。而语言改革是更高层次的组织性管理。

语言管理理论认为语言问题的解决始于简单管理,再从简单管理过渡至组织性管理,组织性管理的终极目标也是解决个人语言问题,Neustupný(1994)认为应尽可能地将组织性管理建立在简单管理之上。

3.2 语言管理的过程

语言管理理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层级程序性(processuality),即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都具有很多层级阶段。

以简单管理为例,简单管理不仅仅局限于“纠正”这一阶段,当说话人注意到(note)某些语言偏离规范时,管理已经开始,也就是说语言管理始于偏离规范的语言。在注意之后——评估(evaluate)注意到的偏离。这一阶段是语言管理理论的关键,因为在该阶段,说话者将语言问题视为偏离规范并给予负面评价。然而,说话

者也有可能正面评价规范偏离。在评价之后，下一阶段可能进行的是调整设计，最终可以实施，也可以不实施。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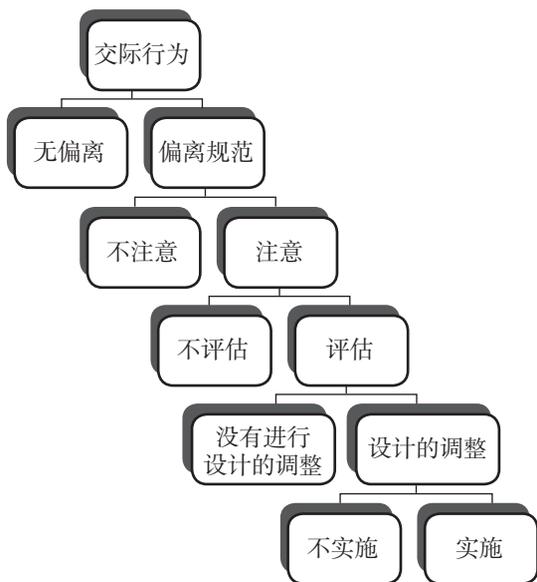


图1 简单管理过程

用下例说明管理过程的一系列过程（M是德国-捷克跨国公司的经理，S是关注该公司交际情境的研究者）^②。

例1：

- 1) M：……谈到工作室，在人事范围内，
- 2) 99% 情况下工作室中没有德国人，
- 3) 没有专家
- 4) S：嗯
- 5) M：[我]喜欢说话时用德国人这个字眼，所以，嗯……

从这个片段中可以看出，M使用了“德国人”这个涉及民族范畴的字眼（第2行），但在短暂沉默后，他用“专家”替换了“德国人”（第3行）。该公司的语言规范是不能使用民族范畴的词汇，因为这些词汇会使人联想到捷克人与德国人共同经历的痛苦历史。因此，语言管理过程是，M注意到自己偏离了规范，明显给予这个偏离以负面评价（在第5行中清楚看出），调整设计（即找到同义的非民族范畴的词）并执行，即使用“专家”这个词来表达。

^② 该例及分析取自 Nekvapil & Sherman (2009c)。

组织性管理也可以区分注意、评价、计划调整、执行四个阶段。注意 (noting) 是基于对简单管理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这个阶段之后是对该语言环境评价、语言政策调整、付诸实施。

3.3 语言管理循环 (cycle)

语言管理理论的特点之一是关注简单和组织性管理间的互动。简单地说,组织性管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说话者在日常交际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语言、交际、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自己无法解决,他们会依靠社会机构中的语言专家或其他专家。这些语言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种:

- a. 在具体交际场景或活动中可以直接解决的问题(如例1中的第2行、第3行);
- b. 在具体交际活动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但说话人自己可以在交际后解决(如通过查阅词典、咨询朋友等途径);
- c. 无论是在具体交际中还是在交际后,说话人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Neustupný (1994: 50) 认为任何语言规划都应始于出现在话语中的语言问题,直到问题消除,规划的过程才算终结。

如果在具体交际中产生的问题是微观问题,在其他社会机构中产生的是宏观问题,语言管理循环可以简单地描述为:

微观 → 宏观 → 微观

这个框架准确描述了以下典型的情境:使用语言的大众所产生的问题,引起语言专家或其他专家的关注;问题解决后,调整方案又为大众所接受;其中,微观 → 宏观 → 微观更有可能出现在本体规划中,而宏观 → 微观更易在地位规划中出现。

当然,这个情境是理想化的。在现实中或在逻辑上仍存在“不完整的语言管理循环”和“语言管理循环片段”:

不完整的语言管理循环: 类型1

微观 → 宏观

使用语言的大众所产生的问题,引起语言专家或其他专家的关注,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或者大众并不接受专家设计的调整方案。

不完整的语言管理循环: 类型2

宏观 → 微观

专家设计的调整方案没有考虑到大众的实际语言问题,却执行了该调整方案。

语言管理循环片段: 类型1

仅在微观层次(大众产生的语言问题只通过进行中的交际加以解决或通过交际前后的管理解决^③)。

③ “交际前语言管理”定义为预测未来交际中潜在问题的管理过程;而交际后语言管理是指发生在某项交际之后的管理过程(详见Nekvapil & Sherman, 2009c)。

语言管理循环片段：类型2

仅在宏观层次（如语言规划机构不关注大众所产生的语言问题）。

实际上，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都很复杂，上面提出的框架并不能完全涵盖。例如，个人对语言问题的认识是变化的，换言之，个人可能总是负面评价规范的偏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以给予中性评价，甚至正面评价。组织性管理需要关注不同的机构管理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问题的方式和这些管理行为是如何关联的。

3.4 语言管理的研究策略

为了覆盖言语社区所有交际问题，Neustupný & Nekvapil (2003) 仿照Hymes (1974) 提出的SPEAKING范式，提出了语言管理的“研究规则/策略”，帮助研究者理清语言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策略包括参与者策略、语言变体策略、情境策略、功能策略、背景策略、内容策略、框架策略、渠道策略。参与者策略是指语言管理理论框架下研究产生语言问题的语言参与者及其分类；语言变体策略是指研究产生语言问题的语言或语言变体；情境策略是指研究产生语言问题的“语域”，如家庭域、工作域等；背景策略是指研究产生语言问题的语言活动地点和时间；内容策略是指研究产生语言问题的语言内容，涵盖范围从交流的主题到一个音位的意义；框架策略是指研究产生语言问题的语言形式，如会话中话轮的顺序；渠道策略是指研究产生语言问题的语言媒介，如书面语、口语。

3.5 语言管理理论研究方法论

组织性管理层次上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基于简单管理的分析之上，这是语言管理理论方法论上的关键要求。因此，分析个人交际的研究方法是语言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语言管理理论不仅可以作为分析和阐释研究资料的诊断性工具，而且还可以直接运用于研究过程中。也就是说，语言管理过程模式可以作为半结构式访谈中提问的向导，第一部分问题与语言使用有关，第二部分与语言管理相关，即与评价和调整有关。与语言管理有关的问题可以询问会话者语言环境是否适合，他是否想要改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如何改变。研究者也可以让会话者分别回忆有语言问题 and 无语言问题出现的语言环境，并且询问其个人经历，使研究者能够将会话者的语言使用、语言管理与其个人经历联系起来。

语言管理理论认为组织性管理必须基于简单管理之上，该理论发展了基于民族志研究的会话分析方法，尤其是会话修正的分析。不仅如此，语言管理理论也关注会话者的心理层面。因此，语言管理理论除了要准确记录自然发生的会话交际的声像资料、进行会话转录和分析之外，更要进行随后的访谈（follow-up interview）。在访谈中，研究者让会话参与者回忆简单管理，如听一段录音片段后，研究者询问讲话者对使用的某个单词是否进行了评价、如何进行的评价。

在组织性管理层次，同样可以划分为注意、评价、计划调整、执行四个阶段，即基于各个层次语言环境的调查研究、语言环境的评价、语言政策的调整、付诸实施。

④ 语言管理理论框架中的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管理

语言管理理论不仅关注语言现象，而且同样关注交际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

Heller(2001:225)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法裔少数民族学校(该校所在城市的通用语言为英语)进行民族志研究,分析了一段师生对话:

例2:

- 1) 教师: pourquoi lit-on? [why do we read?](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 2) 学生: pour relaxer [to relax](为了放松。)
- 3) 教师: pour se détendre, “relaxer” c’est anglais [to “se détendre”(relax), “relax” is English](为了“se détendre”(法语“放松”),“relax”是英语的说法)

在第3行出现了语言管理。教师注意到学生在法语对话中用了英文单词,他给予了负面评价,并进行了调整。这段对话显示尽管教师和学生都具备英-法双语能力,却遇到交际管理的问题,因为学校规定法语是课堂交际语言。在这段对话中,同样存在社会文化管理因素——由于该校接受操法语者的政治和经济资助,教师更愿意“做一个讲好法语的安大略人”。

就组织性管理而言,Neustupný & Nekvapil(2003)认为成功的语言管理取决于成功的交际管理,而成功的交际管理又取决于成功的社会经济管理(如图2)。因此,语言管理必须在社会经济和交际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如要去除带有性别歧视的语言形式(语言管理),其前提得是确保不在交际中使用这些语言形式(交际管理),而要从交际中去除这些语言形式须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保证性别平等(社会经济管理)。

根据语言管理理论,管理的顺序应该是:社会经济管理>交际管理>语言管理,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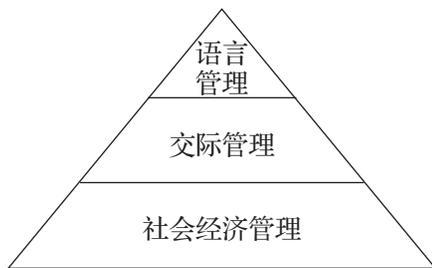


图2 语言、交际、社会经济管理

⑤ 语言管理理论的整合潜能

语言管理理论既不是“平地而起”,也不是“科学革命”产生的全新范式(Kuhn,1970),而是既脱胎于语言规划理论又是语言规划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语言管

理理论有语言规划理论的影子（如组织性规划），又借用许多社会语言学理论概念和模式，如Neustupný（转引自Nekvapil, 2009 : 8-9）认为语言管理理论应该与以下理论进行对话：会话分析理论、甘伯兹的互动社会语言学、语言习得理论、批评话语分析、语言权理论、语言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多文化政策理论；语言管理理论能够进一步整合这些理论或知识体系中的某些方面。

语言管理理论的起点是区分语言使用中的语言生成和语言管理。Neustupný（1978 : 35）明确指出，语言管理理论生成部分的研究范式源自交际民族志研究。该模式可以作为研究基础，广泛记录某个国家的语言管理过程，如Neustupný & Nekvapil（2003）曾详细论述了在捷克个人的语言生成如何与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管理相关联。

此外，在双语或多语的环境中，语言管理理论也可以整合语言接触理论和话语管理理论（theory of discourse management）来解决语言问题。

研究语言的生成必然涉及交际能力，而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Nekvapil（2009 : 9）建议研究语法能力除了可以依靠乔姆斯基的形式语法理论，还可以整合功能语法理论，如由韩礼德创立的系统功能语法。

Jernudd（2009 : 246）认为语言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其关键性研究问题是探究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和大脑的语言官能（faculty）；此外，语言研究也应关注语言的使用。语言管理理论和其他很多的语言学研究一样，致力于语言使用的研究。语言管理理论试图掌握交际官能（communicative faculty）支配下的交际机制（Jernudd, 2009 : 250）。由此可见，Jernudd倡导语言管理理论一方面要与研究语言官能的乔姆斯基形式语言学对话，另一方面又试图弥补乔姆斯基主流语言学的不足，意图与其他语言学科一道探究主流语言学所忽视的语言使用问题。

⑥ 结语：语言管理理论的应用及研究优势

语言管理理论着眼于微观层面个人或社区的语言问题，重点研究日常会话中的语言问题，因此许多研究者将其运用到接触情境（contact situations）^④研究中。此外，语言管理理论可以运用到双语或多语社区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语言迁移与语言保护研究、二语习得和语言教学研究、语言教育规划中。以语言教育为例，沿用语言管理自下而上的理论模式，应首先调查语言学习者在真实语言环境中的语言问题（如规范发音的偏移等），以此为基础选择教育方法、制定教学大纲和语言政策（Muraoka, 2009）。

语言管理确立的语言问题的范围远远超过语言规划所涉及的问题（从语音、音位、形态，到语言教学），并且在语言管理理论框架下，语言问题的解决与交际回

^④ Nekvapil & Sherman（2009b）指出接触情境（contact situations）这个概念基本等同于跨文化情境（intercultural situations），也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间的交际。

题、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相关，如某种语言变体的使用领域不仅取决于语言、文化、态度等因素，更多的是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

语言管理理论研究各个层次的语言问题：在微观层次，如个人、家庭、小型社会网络；在中观层次，文化和职业社团、经济组织、媒体、教育机构、地方政府；宏观层次，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因此，语言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围覆盖语言体系的各个层次和语言使用的各个领域。

总之，Jernudd(2009: 245-252)认为语言管理理论框架是研究“针对语言的行为”的学科基础，是语言规划发展的新阶段，语言管理理论发展前景广阔。

参考文献

-
- ❑ Cooper, R.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Fishman, J. A. 1972.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An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pproach to Language in Society*. Rowley: Newbury House.
 - ❑ Garvin, P. L. 1973. Some comments on language planning. In J. Robin & R. Shuy (eds.), *Language Planning, Current Issues and Research*.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4-33.
 - ❑ Haugen, E. 1983.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us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J. Cobarrubias & J. Fishman (eds.), *Progress in Language Plann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Hague: Mouton. 269-290.
 - ❑ Heller, M. 2001. Undoing the macro/micro dichotomy: Ideology and categorization in a linguistic minority school. In N. Coupland, S. Sarangi & C. Candlin (eds.), *Sociolinguistics and Social Theory*. Harlow: Longman. 212-234.
 - ❑ Hymes, D. 1974.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 Jernudd, B. 1991. *Lectures on Language Problems*. Delhi: Bahri Publications.
 - ❑ Jernudd, B. 1993. Language planning from a management perspective: An interpretation of findings. In E. H. Jahr (ed.), *Language Conflict and Language Planning*.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33-142.
 - ❑ Jernudd, B. 2003. Language planning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Actes del 2n Congrés Europeu sobre Planificació Lingüística, Andorra la Vella, 14, 15 i 16 de novembre de 2001”,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Departament de Cultura, Barcelona, September 2003.
 - ❑ Jernudd, B. 2009. An apology for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In J. Nekvapil & T.

- Sherman (eds.), *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45-252.
- ❑ Jernudd, B. & Neustupný, J. 1986. Language planning: For who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Language Planning. Ottawa, May 1986.
 - ❑ Kaplan, R. B. & Baldauf, R. B.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Mühlhäusler, P. 1996. *Linguistic Ecology: Language Change and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the Pacific Region*. London: Routledge.
 - ❑ Muraoka, H. 2009. A typology of problems in contact situations. In J. Nekvapil & T. Sherman (eds.), *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51-166.
 - ❑ Nekvapil, J. 2006. From language planning to language management. *Sociolinguistica* 20: 92-104.
 - ❑ Nekvapil, J. 2009. The integrative potential of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In J. Nekvapil & T. Sherman (eds.), *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11.
 - ❑ Nekvapil, J. 2010. Language cultivation in developed contexts. In B. Spolsky & F. Hult (eds.), *The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51-265.
 - ❑ Nekvapil, J. & Sherman, T. (eds.), 2009a. *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 ❑ Nekvapil, J. & Sherman, T. 2009b. Introductory remarks. In J. Nekvapil & T. Sherman (eds.), *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i-ix.
 - ❑ Nekvapil, J. & Sherman, T. 2009c. Pre-interaction management 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Central Europe. *Current Issue in Language Planning* 10(2): 181-198.
 - ❑ Neustupný, J. 1978. *Post-structur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 ❑ Neustupný, J. 1994. Problems of English contact discourse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 T. Kandiah & J. Kwan-Terry (eds.), *English and Language Planning*. Singapore: Academic Press. 50-69.
 - ❑ Neustupný, J. 2002. Sociolingvistika a jazykový management. *Sociologický časopis/ 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38: 429-442.

- Neustupný, J. & Nekvapil, J. 2003. Language management in the Czech Republic.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4: 181-366.
-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llefson, J. W. 2002. Limitations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R. B. Kapl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24-425.
- 陈章太, 2009, 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1-7。
- 李宇明, 2011, 用法律管理语言生活。《北华大学》(社会科学版) (3): 4-5。
- 林蔚慧, 2005, 从捷克境内的德语社群论语言认同问题。《台湾国际研究季刊》 1(2): 211-228。
- 刘润清, 2002, 《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苏金智, 2013, 语言管理的层级 (The hierarchy of language management)。第三届语言管理理论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 2013年9月, 布拉格。
- 周庆生, 2005, 国外语言规划理论流派和思想。《世界民族》(4): 53-63。

New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Abstract: Proposed by Jernudd, Neustupný, Nekvapil and associates,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LMT) is a recent advance in language planning theories. According to LMT, language management is performed at two levels — simple management and organized management. In simple management, speakers manage individual features or aspects of their own or of their interlocutor's discourse in a particular interaction. Based on simple management, organized management is trans-situational and more or less institutional. The language management process contains noting, evaluation, adjustment, and implementation. LMT not only deals with language phenomena, but also manages communicative phenomena as well as socio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phenomena. Furthermore, LMT has the potential to dialogue and integrate with other linguistic theories.

Key words: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management;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simple management; organized management